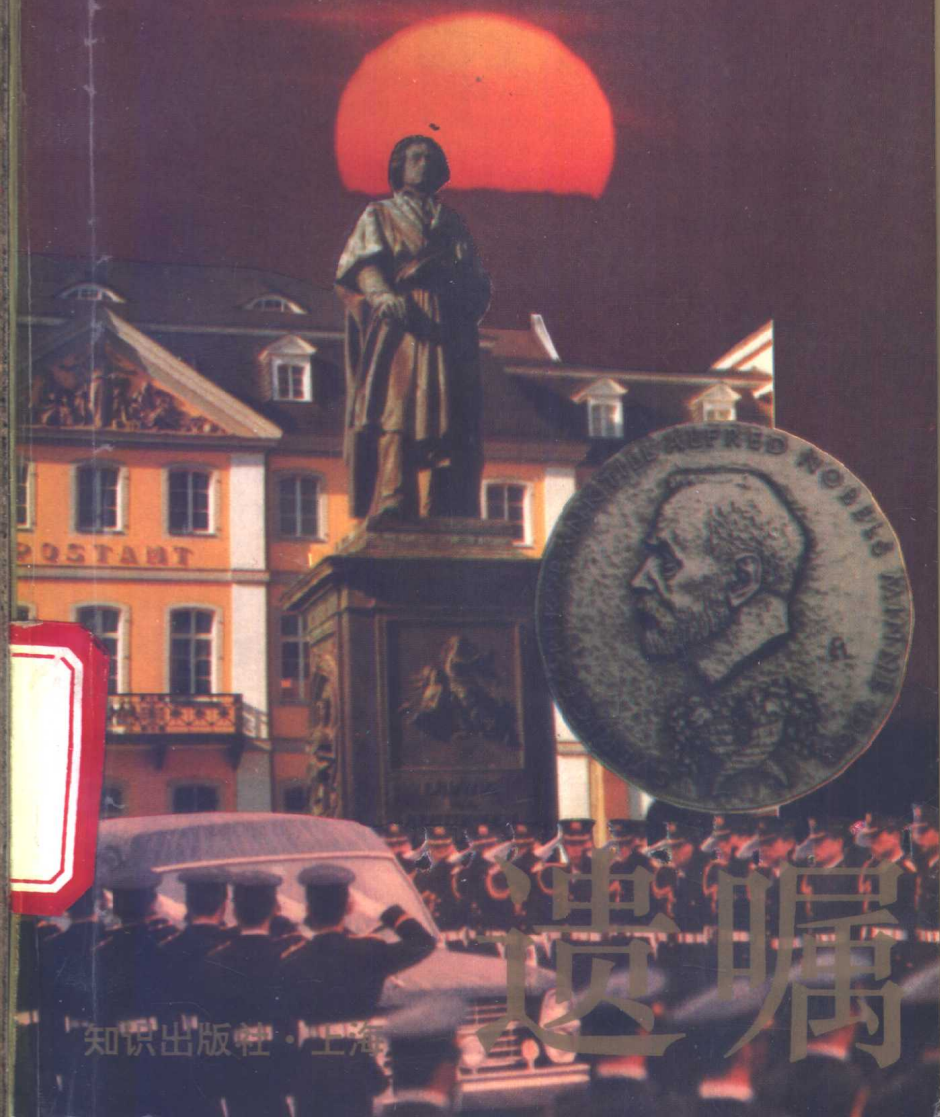


影响历史的一



遗嘱

知识出版社·上海

福州大学
图书馆馆藏

9611721



9611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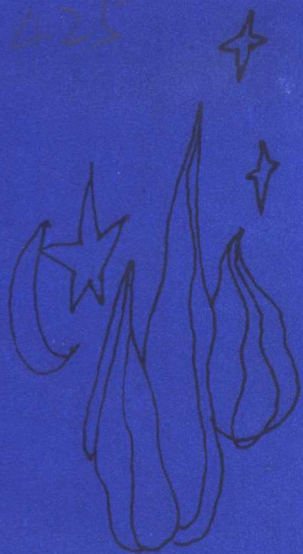
倪华强

周武 编著

影响历史的——
遗嘱

K109

425



知识出版社·上海

(沪)新登字402号

影响历史的遗嘱

倪华强 周武 编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版)

(上海古北路650号 邮政编码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48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15-5634-2/K·36

定价: 8.00 元

内 容 提 要

古往今来,中外许多历史名人在他们告别人世前,往往会给后人留下一篇篇饱含处世经验及人生哲理的遗嘱。这是一笔颇有意义的精神遗产,值得人们去挖掘、利用。本书从影响历史这一视角出发,对17篇有典型意义的中外名人遗嘱及相关情况进行了精心编写,具体涉及帝王、名臣、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民族志士及国际主义英雄等,由于各人情况不同,故有关遗嘱所展示的精神内涵及人格魅力也各具特色,丰富多采,但其主题皆基于对人类未来美好向往和憧憬。透过这一篇篇不同寻常的遗嘱,我们不仅可了解到有关历史名人最后的思想活动,而且能领略到这一活动对其身后世界所产生的回响与震荡。

前 言

遗嘱，顾名思义，是指生命谢幕之际留给后人的嘱托。由于每个人的地位、经历、个性、际遇及境界各不相同，这种临终嘱托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内涵也往往千差万别，但大都真情毕露：有慷慨的悲歌，也有沉重的叹喟；有披沥肝胆的上书，也有悲愤无奈的控诉；有“病废之余”的忏悔，也有看破红尘后的洒脱；有对家国败亡的悲感咏叹，也有对文化命运的沉痛关怀；有血浓于水的家教，也有幽怨哀婉的哽咽；有心灵在无助中的呼喊，也有灵魂在痛苦的呻吟，……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些各不相同的遗嘱，并不是一个“善”字所能概括的，在“善”之外，无疑还包含了“真”和“美”，而这恰恰都是与人类同在的永恒的向往和憧憬。因为有了这种向往和憧憬，人类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发展，生活才会更加色彩斑斓。

近年来，我们一直特别留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文字，并长久地被这些文字深深感染，先后辑著了《中国遗书精选》和《外国遗书精选》两本书。在诠释这些遗嘱的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有些遗嘱曾对当时及其后来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有的为后来者确立了难以逾越的规矩，如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有的激励着后继者去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如孙中山的《国事遗嘱》，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

梦》；有的为后人提供了某种深刻的启示，如梁济的《敬告世人书》；有的导致了旷日持久的纷争，如康熙皇帝的《预立遗诏》；有的则推迟了科学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如诺贝尔的遗书；……所有这些遗嘱，作为一份特殊的精神遗产，都曾在各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浅不同的印痕。把这些深值玩味的遗嘱聚集起来，并结合有关的史实，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它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影响，可以说是我们由来已久的一个共同愿望。恰在此时，我们获知上海知识出版社正在筹划编辑出版一套影响历史方面的书系，经联系，他们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选题，于是有了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其中，外国部分由倪华强撰写，中国部分由周武执笔。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许多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有的曾在书中提及，有的则没有能够一一注明，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我们的谢意。

编者著

1994年5月

目 录

前 言	1
1. 在“贞观之治”背后 ——唐太宗《帝范》	1
2. 恩怨造成的痛史 ——高拱《病榻遗言》	13
3. 它引出了一场皇位继承之争 ——康熙《预立遗诏》	30
4. “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贝多芬最后的“哀乐”	53
5. 成就上帝对美国的许诺 ——约翰·布朗狱中遗书	65
6. 用硝化甘油创造和平 ——诺贝尔临终前的宏愿	74
7. “我自横刀向天笑！” ——谭嗣同《绝命诗》及其他	85
8. 救赎天下之国性 ——梁济《敬告世人书》	101
9. “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的临终呐喊	117

10. 做一个为祖国效命的勇士
——尹奉吉寄语两幼儿…………… 133
11. 人言可畏
——阮玲玉绝笔…………… 142
12.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
——白求恩的两封遗书…………… 154
13. 精诚与日月争光，忠义为千秋矜式
——张自忠誓死沙场…………… 166
14.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倾覆的最后证言
——陈布雷临终进谏…………… 183
15. 迟到的感悟
——法捷耶夫死前心态录…………… 208
16. 让自由之钟敲响吧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 216
17. 人民力量的胜利
——阿基诺夫人实现丈夫遗志…………… 228

在“贞观之治”背后

——唐太宗《帝范》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王朝更迭的历史中，择立太子一向是件关乎整个朝局的政治大事，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曾为此大伤脑筋，寝食难安。唐太宗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例，他晚年在立储问题上可谓费尽心机，并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之中。

一、册立太子风波

唐太宗一生共有子 14 人，其中长孙皇后所生的有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和九子李治。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以嫡以长的原则，嫡长子李承乾无疑应立为储君，将来的皇位由他来继承。唐太宗自然也不愿违背这种制度，因为它至少有两好处：一是可以保证皇室血统的一脉相承，二是可以避免皇帝诸子之间的互相争夺。所以，他从高祖李渊手中接管政权之后，于武德九年(626)十月诏立嫡长子承乾为太子，当时承乾年仅 8 岁。

幼年的承乾冰雪聪明，深得太宗的喜爱，先后聘请李纲、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等名师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教之，刻意加以培养。承乾也颇能领会皇父太宗之殷切期望，

虚心接受师教，对老师莫不“耸然礼敬”。稍长，太宗开始让他学习处理朝政，“庶政皆令听断”。承乾在处理政事时“颇识大体”，后来太宗离开京师出巡的时候，“常令居守监国”，这说明太宗对他是相当信任的，大臣们对他代父处理政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才干也是比较满意的。

然而，作为太子，承乾长期生活于深宫之中，缺少太宗那样接触民间、目睹动乱的社会阅历，对“百姓艰难”了无所知。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身上的骄逸之气渐渐地表露出来，喜好声色，漫游无度，骄奢之极，政治上也开始偏离法度，甚至还制造假象愚弄贤良。每临朝，虽口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褒狎。由于他机灵滑头，善于文过饰非，竟瞒过了许多朝臣的耳目，但这一切都没有躲过太宗的眼睛。太宗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培养承乾成为理想继承人的期望。他决定为太子另觅名师指点，匡正过失。他找到了以直言进谏闻名朝野的杜正伦，要他协助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共同指导太子。太宗对他们寄予厚望，还特意指出：“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希望借助他们的犯颜直谏，纠正太子的过失，改掉“饰非”的习性和纨绔邪气，可谓用心良苦。

恰在这时，承乾脚上患病，不能朝谒，失去了太宗对他教诫之机，于是一班恶少乘虚而入，引诱他走上“侈纵日甚”的浪荡邪道。即使有于志宁、杜正伦的犯颜规劝也很难使他回心转意。杜正伦想不负君望，着力纠正承乾“不闻爱贤好善”的缺陷，但屡次开导直谏都没有明显奏效，只得向太宗照实说了。太宗指示道：“儿子生疾病，是可以理解的。但一点也没好名声，私下常与不三不四之人结交，你可去察访一下，并予以规劝，若不改，一定来禀告我。”太宗认为太子

的君德缺陷比之生理缺陷更为严重，但太子的病足反过来也加深了太宗的恶感。

就在太子承乾失德日见显露的过程中，太宗对魏王李泰的宠爱却与日俱增。李泰聪敏绝伦，文辞美丽，又相貌英俊潇洒，且肅礼接士大夫，使太宗不由得刮目相看，宠异有加。李泰手下的文士心领神会，开始密谋夺嫡之计，特派杜楚客一类人去与朝廷大臣相交，甚至送财物去贿赂，并相机暗示说李泰聪明，“可为嫡嗣”。此时，太宗已初步“有废立之意”，所以他听到这种事，也就“隐而不言”，用听之任之的态度放纵与支持李泰的行动。假如没有废承乾立李泰的意向，太宗是决不可能容忍李泰这种行为的。不少朝臣也从中看出了一些苗头。可是，换宗易嗣毕竟是件大事，太子非有重大过失，是不能任意废黜的，太宗自己由夺嫡而登皇位，对此有切身的体会。也许正因为如此，太宗并没有明确表过态，有所犹豫。太宗的举棋不定引起了朝廷的分裂，在承乾失宠，魏王李泰得幸的情况下，二人“各树朋党”，形成了敌对的营垒。一方千方百计地夺嫡，一方则因失宠而铤而走险，加快了密谋政变的步伐。

太宗对李泰的偏爱越来越明显，甚至暗示李泰将为君主。这一切引起了承乾及其党羽的恐慌，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为了保住嫡长子地位，维护太子的皇位继承权，他们密商应对之策，制订了暗杀与政变两套计划。先是派出刺客纥干承基谋害李泰，企图除去储君的争夺对手，保持太子的地位。后因此计没有成功，只得退而求其次，作出冒险的抉择，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太宗放弃废立太子的决定或逼其退位。然而事与愿违，承乾及其党羽的政变计划很快败露，承乾被废为庶人，汉王李元昌被赐自尽，参与策划宫廷政变的侯君集、李安俨、赵节及杜荷等人被处

斩，一场酝酿之中的政变还没有动手就被扑灭了。

照理说，太子既废，太宗又对李泰恩宠日隆，常常逾乎礼制规定，储君这个位置理所当然是李泰的了。但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其中曲折还有不少。

太宗确实也面许李泰为太子，并曾对侍臣说：“昨青雀自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父子之道，故当天性，我见其如此，甚怜之。”“青雀”是魏王泰的小名，晋王即太宗九子李治。李泰的话自然是一种戏剧性的表演，但也隐约地说明了太宗究竟择立谁为储君依然举棋不定，否则李泰没有必要在太宗面前矫情作态。而此时太宗所以犹豫不决，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皇族子孙的安全考虑。他对唐初“玄武门之变”这幕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惨剧记忆犹新，深知自己如果在立储问题上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重蹈宫门喋血的悲剧，不利皇族子孙的和睦。唐太宗经过冷静的深思，感到立李泰有许多问题，可以说是阻力重重。

元老重臣是普遍反对立李泰为太子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与褚遂良等人过去都主张保留承乾的太子地位，不赞成改立魏王李泰，现在自然也不会支持李泰为储君。当岑文本、刘洎、崔仁师等人纷纷密表奏请太宗立李泰为太子时，长孙无忌便首先极力反对，褚遂良也毫不掩饰地对李泰的承诺提出质疑。他说：“陛下失言，伏愿审思，无令错误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后，魏王执政为天下之主，而能杀其爱子，传国于晋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而复宠爱魏王，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良由嫡庶不分，所以至此。殷鉴不远，足为龟镜。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始得安全耳。”以太宗的政治经验，本来不难识破李泰许诺的虚伪与欺骗性，只是不愿戮破而已。褚遂良则顾不了这些，一

下子把太宗心中的矛盾揭示出来，使他再也无法回避。他权衡利弊，强抑自己的心理矛盾，涕泗交流地说：“我不能。”

实际上，择立李泰还是李治，不仅关系他俩的生死，也直接关系到承乾将来的命运。特别是承乾被废时的一番自我辩解让他深感不安，不能不三思而后行。承乾的政变计划流产之后，太宗曾面加谴责，承乾说：“我贵为太子，还有什么要追求的呢？主要是因为李泰要谋我这地位，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而致使别有用心之人教唆我做不轨之事。现在若以李泰为太子，那不正中他下怀吗？”这段话既合情合理，又意味深长，自然会引起太宗的深思。太宗最初动念立李治为太子，可能就是这句话引发出来的。从感情上说，他一贯属意李泰；从理智上说，他不能不择立李治。出于对皇族内部的和睦与安全的深切忧虑，也出于玄武门骨肉相残的惨痛记忆，太宗最后干脆一并舍弃了承乾和李泰，而改立九子李治为太子。定策之后，太宗立即向朝臣表示：“我若立李泰，那么，承乾、晋王皆不免一死；但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则泰与承乾可无恙也。”

这是他经过长期考虑与权衡的最终结果，太宗的这几句话把所以弃泰而立治的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他择立李治为太子实在是不得已，但却对日后政局稳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少是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纷争和混乱。司马光曾就此发表议论说：“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九子李治被立为太子，是太宗再三权衡的产物。其实太宗本人对李治的“仁弱”，以及缺乏像自己的英武果断作风，很不满意。所以，太宗弃泰立治之后思想上仍有反复，曾一度暗中向长孙无忌提出立李恪为太子的想法。太宗看

中李恪，是因为他有文武之才，且有英武果断作风。这个想法，不用说遭到了长孙无忌的抵制，说李治本性仁厚，正是守成的良主，希望太宗在立太子这件事上，不要再举棋不定。如此，太宗只好作罢。

二、《帝范》：一份政治遗嘱

太子废立风波过去之后，太宗委实松了一口气，但如何使仁弱的李治成为理想的继位者，以保证贞观时期所推行政策的延续，又成为摆在太宗面前的急迫任务。在这一方面，太宗确实是煞费苦心，他选用了一批元老重臣，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辅佐”班子，史称“东宫僚属，皆盛选重臣”，如太子太师长孙无忌、太子太傅房玄龄、太子太保萧瑀、太子詹事兼太子左卫率李勣、太子宾客褚遂良等等。太宗深知李治庸懦，非有“良佐”重臣，不足以成大事，所以精心为太子挑选师傅、“良佐”，以化成其德，成就王业。除此之外，太宗还亲自教诲李治。这种规导多半与为君之道有关，有时采取经义结合民间具体利病的方式，有时则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等等生活琐事，但无论哪一种规导方式，都浸透着深刻的为君治国的哲理，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太宗个人的政治经验和为君之道。

太宗晚年对太子李治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希望他尽快成长起来，以便肩负起社稷重任，但太宗对李治并不放心。因为不放心，所以更强化对李治的教育。就在临去世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648）春，太宗还亲撰《帝范》一书，当作皇帝的政治教科书赐给李治，希望他认真研读，以为日后即位遵循、效法。书中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及《崇

文》共 12 篇，这既是他一生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他留给储君李治的政治遗嘱。他在《帝范后序》中说：“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终实难。”并告诫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善始善终。他对太子说：“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就是说，他已把自身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完整地总结出来，留给太子李治作为“修身治国”的教科书，使自己开创的“贞观之治”得以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

那么，在《帝范》中，唐太宗除了告诫太子李治善始善终之外，究竟总结了哪些经验？或者说他究竟为李治提供哪些有关治国之道的理论？《帝范》因是太宗统治生涯的全面总结，所以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概括为“君道”二字。《帝范》开篇就集中地讨论为君之道的理论，而且，其他各篇也都是围绕着“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的，即“君道”在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宋史学家范祖禹特别称赞“太宗可谓知君道矣”，是有道理的。

太宗所说的“君道”，自然并不是他所独创，而是来自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其核心内容就是儒家“仁政”、“仁义”思想及政治原则。太宗一生非常尊崇儒家，重视儒家，即位之初就曾说过：“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在儒、释、道三家之中，太宗选择了儒家，而且把儒学当作不能须臾以离的东西。对于佞佛的梁武帝和崇道的梁元帝，他皆报之以无情的嘲讽。对于法家，太宗同样认为不足取，他说：“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

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有一次太宗问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回答说：“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以为然，但他并不是要取消刑罚，也不是要鄙薄法律，太宗本身非常讲求法律，但他把儒学置于首位，认为刑法毕竟是第二位的東西。正是在这种以儒御法、法服从“仁政”的思想指导下，才出现了“贞观之治”下的宽缓刑罚。魏徵一生谏皇帝200余事，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很多，但太宗却把它归结到一点上，说魏徵是“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即使评论古人时，太宗也主要是以“仁义”作为衡量的尺度，他特别肯定晋武帝“仁以御物，宽而得众”，“有帝王之量焉”。他所谓“抚九族以仁”，也就是把儒家的“仁政”理想推而广之，运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太宗以前，国学中“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为了提高孔圣人的地位，他下令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并且还封孔子裔孙孔德纶为“褒圣侯”，以示崇孔。唐太宗规定：“国胄”要以古代儒家的著作为教材，而且以左丘明、马融、郑玄、杜预等21名唐以前儒学大家配享孔子庙堂。太宗的崇儒重道于此可见一斑。

与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不同，太宗不仅在言论上崇儒重道，高擎儒家的“仁政”理想，而且把这种“仁政”理想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去，也就是把儒家的“仁政”理想与具体的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不但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道。正因为如此，太宗的政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贞观之治”，并因此，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明君王。

例如，隋唐之际，经过十余年的社会大动荡，经济一片萧条，出现了“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

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到了太宗“践祚之始”，仍然是“霜旱为灾，粟价腾起，突厥侵抄，州县骚然”。如何医治战乱留下的创伤，使残破不堪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是摆在太宗面前的严峻而艰巨的任务。太宗认真总结历代帝王的治败原因，大力推行轻徭薄赋、疏缓刑法的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任，坚持法制，虚怀纳谏，以史为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社会经济得到复苏与进一步发展。史称太宗统治时期“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是个少见的升平时代。从唐初的凋敝到贞观年间的升平，这种巨大的转变，无疑证明了太宗是个兼备理论、才能和效果的全面人物。他发展了自古以来的政治理论，并把这种政治理论推向实践，付诸实施，然后又以自己的理论和治绩撰成《帝范》，垂范于将来，使他成为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模范皇帝。

又如，太宗一生武功与文治兼隆，他“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史称“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所称，一人而已”。在他的一生中，前半期风餐露宿，戎马倥偬，在艰苦备尝的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武功；登极之后，又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创造了“振古而来，未之有也”的文治。惟其如此，后人一直把他作为一位理想君主与模范皇帝来推重与景仰。唐朝人吴兢说，他编纂《贞观政要》的目的就是“庶乎有国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意思是说，唐太宗可以代替儒家一贯推崇的理想君主，成为后代有国有家者的楷模。

但是，“贞观之治”并没有尽善尽美，还存在着不少弊政，尤其是贞观后期更多。早在贞观十三年（639）五月，魏徵就上疏太宗，指出太宗善始而不能克终者有10条之多。具体表现为贪求珍宝、轻用人力、不愿纳谏、亲近小人、好尚奇